

「宋氏家族史料整理與研究專題論壇：宋氏家族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綜述

任育德 國立中正紀念堂研究典藏組副研究員
輔仁大學全人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一、會議籌備緣起

2010年5月，中國大陸上海復旦大學成立近代中國人物與檔案文獻研究中心，推動近代中國人物和相關檔案文獻研究，也是搭建匯聚交流海內外學術研究信息和成果的平台，是該校歷史系與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多年合作產物。該中心成立後，成員參與教學及研究生培養，也設立若干研究室、專題組，開展與海內外檔案文獻及學術機構合作，透過專題方式合作整理選編和出版檔案史料、舉辦學術會議、撰寫發表研究報告與論著。該中心陸續辦三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復旦——胡佛近代中國人物與檔案文獻研究叢書」出版美國宋子文檔案選編4冊、《宋子文與他的時代》圖文書、專題論文集2冊。

本（2015）年該中心與胡佛研究所合作階段性任務即將完成，以「宋氏家族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主題舉辦學術論壇，在宋氏家族故鄉的上海召開會議別具意義，共106人與會，發表42篇論文。研討會於6月18至19日在上海復旦大學逸夫科技樓多功能廳舉行。開幕式中，復旦大學歷史系主任黃洋教授致詞歡迎來自各地的與會學者。復旦大學近代中國人物與檔案文獻研究中心主任吳景平教授簡述該中心與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推動《宋子文檔案》目錄建置及內容數位化工作即將完成，學界利用與研究更形便利。該中心整理胡佛研究所典藏

《宋子文檔案》，也關注寄存該中心之《蔣中正日記》，希望加強蒐集與整理人物檔案、數位化目錄，克服家族成員考量隱私及所有權問題後，資料庫得公開運用。



與會學者合照 (照片提供/任育德)

第一位主題演講人香港珠海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胡春惠教授表示，上海與香港扮演推動中國思想交流、促進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兩大核心，人物思想具有多元與先進特色，因此本會別具意義。同時，宋氏家族成員(註1)作為不僅影響戰爭本身成敗，也涉及戰後世界秩序重建與發展，會議已跨越家族史格局，具有國家史、世界史討論會意義。

第二位主題演講人宋仲虎先生(Leo Soong, 宋子安先生次子)表示，宋耀如具備拯救貧窮、受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熱情，讓子女受高等教育得以具備參與建設新中國的能力。宋仲虎透露家族軼聞一則，蔣中正、宋美齡夫婦訪問印度期間，請廚師陳漢貴到英國駐印度總督廚房察看歡迎晚宴的準備，陳漢貴回報看到印度廚師將掉落骯髒地上的晚餐牛排草草刷洗，放回煎鍋，是印度廚師隱示反抗英國殖民政府的行動。宋仲

虎表示，因為《宋子文檔案》開放前後的閱讀經驗，讓他對照家族長輩敘述與檔案，重新認識家族與現代中國的歷史。他引用宋美齡一段話：「個人的挫折是多麼的微不足道，上帝的愛是多麼偉大。內心增長的力量使我重新振作，去面對未來。」(註2)說明宋氏家族信仰之虔誠，為主題演講作結。

二、會議討論大要

在「戰前宋氏家族活動」主題相關論文中，青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盧豔香探討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簡稱中政會)功能與作用，指出該會曾是該黨最高政治指導機關，宋氏家族成員參與其中見證家族實力，中政會決議也充滿威權人士意見角力痕跡，並牽動蔣中正、汪兆銘權力關係。浙江大學蔣介石研究中心主任陳紅民教授〈蔣介石與宋子文關係——以《蔣介石日記》為視角(1925-1949)〉(論綱)，將二人關係分為密切合作(1925-1926)、政治結盟的親戚(1927-1937)、不可或缺的助手(1938-1945)、各自分飛(1946-1949)四期。他觀察到宋子文是蔣中正在日記中經常提到、出現時間最長、責罵內容最多的幾個人之一，因此蔣中正、宋子文在政治與親情之外的互動，確實值得深入討論。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業務部副處長、副研究館員朱玖琳指出，共產國際為防止敵對國進攻蘇聯與達到世界革命

目標，借助文化人影響力發起成立反帝大同盟及世界反戰委員會，也因應國際局勢調整策略。宋慶齡身為反帝大同盟名譽主席、世界反戰委員會中國代表，呼應共產國際策略調整，在 1937 年到 1938 年籌組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過程中，呼籲各國支援中國抗日，爭取各國輿論與物質支持。

「宋氏家族與戰時外交」主題相關論文中，筆者撰寫提會論文，精細觀察 1942 年 1 月蔣中正訪印度到 1943 年 5 月宋美齡訪問英國建議案告終時段內的國際局勢與中英關係，指出蔣中正戰時外交決策實不能忽略運用靈活外交手腕爭取提升國際地位的用心。由中國針對宋美齡是否訪英、中國是否出席 1943 年 5 月華盛頓高峰會相關決策過程可知，中國國家領袖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思想，但也不忘靈活外交手腕及國家利益，戰時外交決策有「現學現賣」的表現，同時外交幕僚人才進用與現代化訓練也有待加強。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貞研究員以精研 20 世紀中俄關係史及俄羅斯共產國際檔案享譽國際，她認為宋子文在 1945 年 6 月及 8 月兩度出使蘇聯談判工作，受到「雅爾達密約」之簽訂影響，中國無法掙脫密約框架之不平等格局，只能忍氣吞聲地談判及簽訂中蘇友好條約。蘇聯實非對外宣稱之「無私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中國強力支撐反侵略戰爭的東方戰場，發揮牽制功能不容忽視。俄羅斯社會科學院遠東研究所（Institute of Far Eastern Studie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高級研究員韋艾蘭（Alla Verchenko）及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前館長、副研究館員孫娟娟，透過不同來源史料，均指出 1938 年至 39 年間，中、蘇兩國因為中日戰爭使國家利益一致時，加以孫科富有個人才華與務實外交手腕，始能赴蘇談判，取得 2 億 5 千萬美元借款，支援中國購置軍用物資和裝備。蔣中正此時信賴孫科，證明是正確決定。

「宋氏家族與戰時內政經濟」主題相關論文中，有從大架構的解釋面探討，也有微觀性針對政策、機構探討者。解釋面探討以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University of Nebraska）歷史學系 James L. Sellers 講座教授柯博文（Parks M. Coble）為代表，他針對近年中國學者逐步透過新檔案資料開放，探索戰時經濟與通貨膨脹，指出西方學者應重新檢視既有論點的客觀性，尤其是那些出自與孔祥熙、宋子文為敵，甚至成為主流意見者。他認為從今日觀點與新史料考察 1937 年到 1949 年間孔祥熙、宋子文因為國民政府通貨政策失敗遭致抨擊，大多是沒有根據的。就歷史背景言，孔、宋實無正確處理方式解決通膨問題，更無最終決策權，責任無從負起。

微觀面探討，如國史館修纂處前處長侯坤宏分析糧政制度，指出軍事委員會在戰時重要性凌駕其他政府組織，蔣中正又非常注重細節，許多事情會親自指揮的個性，不止在軍事、貨幣，也表現在戰時糧政問題。蔣

中正於解決糧食問題，的確費盡心力，也扮演重要角色。日本慶應大學教授段瑞聰探討宋子文開發海南島問題，指出「開發海南」要放在國民政府欲實現孫中山「實業計畫」及推動新生活運動雙重因素之下理解，海南島蘊藏資源漸受日本重視及宋子文故鄉情結也有其作用。戰爭期間，日本藉占領機會進行海南開發。1947年國民政府設立海南特別行政區，賦予守衛南海島嶼的新使命。宋子文也希望引進日本技術與經驗促進海南開發，即邀請熟悉此事之峴內干城主持相關工作。1949年1月下旬宋子文辭去廣東省政府主席，海南開發計畫即遭擱置，人去政息。

機構面探討者，如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鄭會欣論及，宋子文兄弟經營中國建設銀公司在抗戰爆發前處於業務迅速發展期，戰爭爆發造成公司大量虧損，公司慘澹經營，並聯絡外資開闢煤礦進行資源開發，從事後方建設，以盡力協助中國抗戰勝利。但也不能諱言，公司領導人憑藉與政府關係，與美國財團建立聯繫，為公司在戰後成為美國財團代理創造條件。雲南師範大學華文學院講師夏玉清指出宋子良主持西南運輸處設立分支機構，成功擴大運輸網絡，提升軍事物資運輸效率；西南運輸處又與南洋知名僑領陳嘉庚主持「華僑協會」合作，募得3,192名司機、修護技術人員，解決戰時軍事物資運輸缺乏的技術人才問題。

「宋氏家族人物互動關係」主題論文自是回歸歷史研究與「人」有關。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奇生〈蔣介石與宋藹齡〉（論綱）指出，蔣中正尊敬在宋家甚受尊敬的宋藹齡，日記記述相對正面與親密感，顯示宋藹齡對蔣的影響力不容忽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林美莉指出，陳光甫主持的桐油貸款是中日全面戰爭之後第一筆成功的借款，實為陳光甫吸取前人走「政治借款」一途，卻因債信不良而失敗經驗，改走商業借款「易貨償貸」模式，先為中國建立良好債信，方為宋子文後續執行鎬沙借款奠下基礎。宋子文復掌握國際局勢激變契機，逐步透過金屬借款、平衡基金借款、信用借款，重新執行並落實蔣中正所希之無擔保「政治借款」。商業借款或政治借款型態之採行轉換，與中國國勢及美國國情雙重因素有關。宋子文、孔祥熙之間權力爭奪也催化了借款模式之轉換。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吳景平提到，宋子文在國民政府擔任實職時，蔣宋關係史料較為豐富，容易研究二人關係；反之宋子文在1933至1940年間遠離政治期間，資料相對零散。中日戰爭爆發後，蔣、宋在中國銀行債務責任問題看法不同，意見不一。蔣最初也只安排虛職予宋，或為人事糾結、或受體制限制。1939年9月歐戰爆發，中國與西方國家外交增加急迫性，蔣始逐步決定起用宋，宋擔任蔣私人特使赴美執行外交折衝，從而開啟雙方重要合作關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

長汪朝光分析，孔祥熙在抗戰開始後主和事蹟，致其出任行政院長起不斷引發國民黨內外批評，加以孔施政政績口碑不佳，為人高調，引發外間疵議不絕，唯軍政大權集中於蔣，孔亦有代人受過之成分。1939年11月20日，孔祥熙辭卸行政院長職，退居副職，即是蔣的維護情誼表現。

「宋氏家族與戰時社會」主題論文，可從社會福利、空間地理的意義作用著眼，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學術副院長張瑾透過檔案及口述訪談，鋪陳宋美齡關注社會福利與幼童福利及教育問題，籌辦戰時兒童保育會，為爭取海外募款致信各方，獲得美國人士共鳴的歷程，指出系列作為協助宋美齡個人公共形象建立。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與資訊研究所副教授邵銘煌透過歷史影像另闢新途，重建宋美齡投身武漢抗戰表現，指出她深諳影像傳播感動人心的力量，督導紀實影片《四萬萬人民》（The 400 Million）製作，向美國人民傳達中國抗戰到底的決心與行動。蔣中正亦稱許宋美齡「對於服務教育與婦女運動之熱心日進，不僅心慰，而使余亦更加興奮。患難中惟此得以欣悅耳。」（註3）德霖技術學院不動產經營系暨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陳英杰關注香港在宋氏家族活動軌跡中的關鍵角色，指出香港從1937年8月淞滬戰爭到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匯聚各路人馬，移居香港的宋氏兄妹透過香港爭取外界援助中國，或襄贊軍經交涉。宋美齡也藉由在香港治病時

機，推動國際宣傳工作，並眼見英國與港英殖民政府自利態度，讓她留下負面及不信任印象。

「宋氏家族與中外關係」主題則涉及人物活動與個人形象建立兩層次。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後研究員賈欽涵提出宋子文在1944年國共談判扮演不可替代角色，以維護國民黨政權、全力爭取美國信任與支持國民政府為目標，爭取美國、蘇聯外交支持，以解決國共問題，但受限中國社會尚未步入現代化，以及國共兩黨根本利益衝突，無法透過外交途徑解決國共問題。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業務處副研究館員宋時娟透過中美檔案，歸納美國政府、公眾和媒體對宋美齡這位「客人」造訪的應對及反應，說明宋美齡訪確實受到美國支持，與美國既定對華政策相輔相成，也不免有誤解與文化差異。各種矛盾情緒或報導也反應中美之間的利益訴求、文化衝突，以及兩國事實上的不平等。美國韋伯州立大學（Weber State University, Utah）歷史系教授劉易斯（Greg Lewis）藉由宋子文同一代人士、政府官員、日後冷戰學者研究，指出描述宋子文印象的不同觀點。隨著宋子文歷練不同政府公職，與之交手美國人士各有正面、負面反應，也難以將他與家族、政府成敗榮辱截然區分，也是「誰失去中國？」討論的避雷針。時至今日，中國社會環境大有轉變，重估宋子文確有必要。上海復旦大學博士生張寧靜認為，由於中美軍事體制差異

造成對同一職位認知存在分歧，雙方談判之初，不管是羅斯福總統、宋子文、蔣中正都有所誤解，也未能釐清。因此，史迪威在華職權紛亂，各方均難辭其咎，也非獨宋子文或蔣中正一人力量即可釐清。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研究員岩谷將、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文文書編纂部主任富塚一彥均透過日本現存檔案史料，探討中日戰爭期間反覆的謀和工作。富塚透過日本外務省文書呈現日本軍政界於談判工作的設計與構想，隨著美日關係漸趨緊張，在美國首都的宋子文積極遊說美方支持中國作戰並強烈反對美日協議談判均為事實。岩谷指出日本政治經濟界積極肯定宋子文實務能力，軍方雖一度對宋子文感到興趣，卻因無法瞭解其內心態度，最終放棄謀和宋子文工作。

有關「宋氏家族相關檔案數位化及利用介紹」主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副館長馬振犢報告該館民國檔案數位化進程，指出質量把關的重要性，以及數位化工作時進行檔案修繕。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東亞部主任林孝庭介紹館藏重要戰爭史個人檔案、宣傳海報，指出善用史料進行政治史、文化史議題研究的可能。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研究館員王成志介紹普林斯頓大學馬德手稿圖書館（The Seeley G. Mudd Manuscript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所藏魏勞爾檔案（Whiting Willauer Papers），陳述魏勞爾擔任宋子文

秘書，以謀士和鬥士角色協助中國國防物資公司運作，幫助宋子文、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和飛虎隊解決戰略與技術難題，他與宋子文的信賴與互動關係值得外間關注。美國歐柏林大學東亞館藏及網絡發展館員陳晰介紹該館典藏孔祥熙長期創校與擔任董事會成員的銘賢學校（Ming Hsien Schools）與歐柏林大學（Oberlin College, Ohio）銘賢托事部往來信函，收錄於歐柏林山西紀念協會檔案內，與二次大戰相關者涉及學校戰時資金募集、中國教員與美方代表安全、孔祥熙個人健康狀況與卸任政府職務的過程及歷史背景，也提供側面理解孔氏的史料。他在中美兩校之間扮演了橋樑與聯繫作用，有助呈現孔氏在為人所知的財經人物角色外，鮮為人知的教育家與外交家職業活動。

綜合座談中，李又寧、馬振犢、李玉貞、程兆奇、潘邦正、岩谷將、林美莉、郭岱君、陳立文、胡春惠、任育德、吳景平等與會學者針對會議討論成果，進行簡短發言及意見交換，並向主辦單位深致謝意。吳景平教授表示，會後亦會將成果出版，將透過中心網站公佈相關訊息。

三、會議觀察所見

本次會議發表論文，在中國大陸學者外，亦有相當數量海外學者論文，除一位因事無法到場外，均親自在場報告並接受

提問。筆者簡單統計，42 篇與會論文中，中國大陸佔 26 篇、中華民國 5 篇、日本 4 篇、美國 5 篇、俄羅斯 1 篇、香港 1 篇（見統計圖 1）。中國大陸與會論文中，以作者服務單位計，14 篇出自科研教學機構，4 篇出自檔案館及圖書館，8 篇出自上海相關人物紀念館所（見統計圖 2）。由統計結果顯示，本次會議規模雖以大陸學者為主，已注意會議論文來源之多樣性，藉以促進各方史學工作者學術及知識交流；一併給予上海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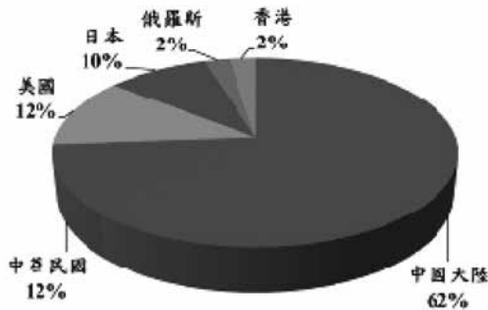


圖 1 與會論文來源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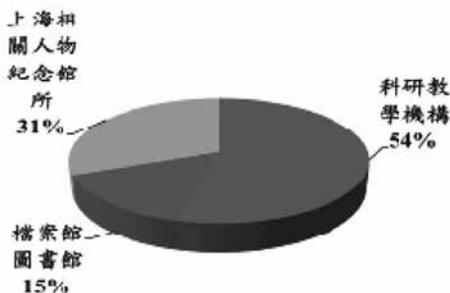


圖 2 中國大陸提交論文作者服務單位

區相關人物館所參與相關主題學術會議就近吸收專業新知、展現個人專業研究成果，結識其他區域館所人員的表現平台，上海館所與學術機構之間的長期合作關係亦由是可見。

本次會議名為「論壇」，實有國際學術會議性質，讓中國大陸、臺灣、美國、日本等地學者充分進行意見交流的「論」，同時也讓中國大陸學者更加理解先前較少接觸的日方史料，會中也不致充斥民族主義情緒言論，在中國大陸實屬難能可貴。去（2014）年筆者參與浙江大學蔣介石研究中心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正值釣魚台問題緊張致使中國大陸與日本陷入關係低潮，故無日本學者提交論文並與會，即為鮮明對照。營造一個成功的學術交流平台並非易事，主事者的眼光、能力與分寸拿捏，加以環境時機因素，均甚關鍵而缺一不可。

中國大陸的近代史學界近年逐步提升史料掌握程度，以檔案史料為基礎言說論述，與臺灣相關領域史學工作者已有共同對話空間，或許在意識型態上仍存在差異，但較為嚴謹之近代史研究著作不再奉宣傳意識型態為規臬，亦是事實。此次與會之中國大陸史學工作者也大致保持如是態度，較前人相形客觀正視國民政府面臨戰時環境限制與持平評價。偶有年輕學者發言出現「政治先行」態勢時，亦會遭逢師長善意勸告，的確也是令與會者感受教師言教力量的一環。中國大陸青年學子的積極態度，也流露於言

談之中。臺灣史學工作者在中國大陸學術刊物及學術會議發表學術論文、進行學術交流已屬大環境趨勢，史學工作者適時參與具有號召力機構組織之學術會議也是必然。

四、結語

現今中國大陸學者仍是有限的運用日本公布史料，透過多方史料相互對照情形有待加強，與日本學者進行對話更屬必要。就此次會議觀之，日本學者發表有關戰爭期間中日議和工作，因為掌握史料以及觀察角度不同，認為議和成功於中國並無損失，也有利日本早日結束戰爭主張，報告之後隨即引起中國大陸及臺灣出席學者熱烈議論，以為在國民政府立場而言，若真接受日方用政治軍事雙重手法壓迫之議和條件，將使中華民國國家利益遭到巨大損失，並非民意所趨，更將無從遏制日本殖民亞洲及侵略野心，是否真的有利於日本國家利益與長期發展，值得深思。各方在理性思考下進行分析與對話，也是學術討論可貴之處。中國大陸與中華民國學者對於日本學者的思考方式、對話方式，也將有另一種理解與體會。目前也有學者如北京大學王奇生和日本中央大學深町英夫合作，計劃將日本有關中日戰爭、太

平洋戰爭研究成果介紹到中國（預計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日本學者筆下的二戰史》），（註4）將會是在步平主編《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之外，知識交流的新成果及後續對話的新開端。

至於以研究團隊組織，參與成員就專精處入手，匯集多角度、多來源史料進行跨區域甚至是國際性研究中國近現代史議題之風，正方興未艾。無論是臺灣，或者是中國大陸在資訊流通快速的當下，在爭相組織團隊之餘，如何在此風潮中找到研究相應之道，在研究進程中穩紮穩打獲致可經檢證的研究成果，一併透過團隊力量進行國際學術交流，也將是研究者所面臨的新挑戰。

【注釋】

1. 該會以「宋氏家族成員」在血緣的宋氏家族之外含括因婚姻關係加入宋氏家族的姻親成員與子嗣（蔣中正、孫中山）。
2. Mayling Soong Chiang, *The Sure Victory* (Westwood, New Jersey: Fleming H. Revell, 1955), pp. 43-44.
3. 《蔣中正日記》，原件藏於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1938年10月6日。
4. 彭珊珊整理，〈北大教授王奇生：中共的抗戰重新成為研究熱點〉（2015年6月30日），《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baidu.jsp?contid=1345665>（2015/7/6 點閱）。